

HIST5590 中國近代史專題研究：近代中國的普通人  
2017—2018 年度下學期 期末報告

## 孫中山紀念與國家象徵—從《大公報》看國民政府與 傳媒之合作與角力（1927—1945）

授課老師：賀 喜教授

學生姓名：陳偉建（1155087733）

### 提要

1925 年孫中山因病去世，全國掀起哀悼熱潮，而國民黨也順勢展開一連串悼念活動，並在北伐完成和中山陵建成後持續派政要出席相關活動。他們持續性的紀念即使遇到剿匪、九一八、國共合作及八年抗戰，不單沒有停止，還在不同時候賦予不同政治內涵。還有民間的反應例如媒體評論，也是同時參與在這場持續紀念當中，並跟國民政府一同抬舉孫中山成為全國普遍性的國家圖騰。本文今次會以國民政府 1927 至 1945 年之官方紀念及《大公報》社評作為主要研究對象。探討兩方在營造孫中山作為國家象徵過程中的異同，帶出兩方在每年孫中山忌辰為孫氏進行包裝的同時，是合作「唱好」孫中山，還是分庭抗禮各表心中的「孫中山」，藉此明白孫中山國父形象及國民政府與傳媒之間關係。

關鍵字：孫中山、國父、偉人紀念、國家象徵、大公報

## 1. 前言

所謂的「國家象徵」，即是泛指能夠代表某國家的一種或多種事物，反映該國家價值觀，它亦是國家政治圖騰及文化載體，並通常被用以增強國民自我認同。本文提及的主角孫文（下稱孫中山、孫氏），因指導革命組織推翻帝制，創建共和政體，後來被國民政府於 1940 年追封成為「國父」。<sup>1</sup>

1925 年 3 月 12 日，孫中山因病去世，消息傳開之後，全國廣泛舉行大大小小紀念和哀悼活動。而正跟北洋政府對抗的國民黨，亦把握機會高調悼念孫氏，並對《總理遺囑》等言論包裝成為思想教育以推廣出去，而 1929 年舉行的南京奉安大典，更是整個悼念中的最高潮，不少政要和民眾親睹這場盛大的儀式。孫氏紀念不單令國民黨贏得威望以鞏固政權，且令孫氏革命先驅的形象深入百姓記憶。在共產黨奪取中國大陸統治權之前，全國各地有不同形式的孫氏崇拜，即使遇到剿匪、九一八、國共合作及八年抗戰，不單沒有停止，還在不同時候賦予不同的政治內涵。多年來的紀念表示著孫氏已經從國民黨黨員認同的「總理」，被抬舉成為全國普遍性的國家圖騰，這都是國民政府有意無意營造氛圍的效果。

關於近代中國以來的國家象徵之討論，隨時間推移愈來愈多，亦幫助我們更全面了解國家象徵的制定與國家政經發展的關係，大部分論述集中於描述和分析孫氏身後治喪活動細節，並與古時的帝王崇拜相提並論，解構政權如何透過偉人葬禮來強化自己的正統性。

要細數較為深入探討的，包括陳蘊茜著作《崇拜與記憶》，主要將政治意識與個人崇拜扣緊，從大量原始資料、媒體、地方文本中，引證國民黨如何透過政治影響力去滲透民眾的記憶，尤其她對整個奉安大典的儀式分析細緻，並得出國民黨努力利用民族主義思潮將孫氏塑造成鞠躬盡瘁的建設者。<sup>2</sup>潘淑華就進一步將時間線推前到蔡鍔、黃興去世的時候，透過這兩人的葬禮，反映背後國民黨內兩派政治角力如何融入「死亡文化」，同時表述北洋政府如何利用葬禮來挽回威信，而蔡、黃支持者又透過儀式來爭取主導政治的籌碼。<sup>3</sup>再早一點，王來兵碩士論文關於黃花崗烈士崇拜討論，也從黃花崗陵園的建造、建築空間和儀式紀念來指出烈士如何被詮釋成為愛國和維護政權合法性的工具，令民眾覺得「烈士等如愛國」，可見國民黨偉人紀念的營造在孫氏在生時就已經進行。<sup>4</sup>

---

<sup>1</sup> 〈國民政府訓令渝文字第三一九號〉，載《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渝字第 254 號，1940 年 4 月 3 日，第 11 頁。

<sup>2</sup> 陳蘊茜，〈神聖儀式於孫中山符號的建構〉，《崇拜與記憶：孫中山符號的建構與傳播》，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 8 月，頁 85 至 146。

<sup>3</sup> 潘淑華，〈國葬：民國初年的政治角力與國家死亡儀式的建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83 期，2014 年 3 月，頁 47 至 87。

<sup>4</sup> 王來兵，〈現代性轉型背景下的權力與建築——廣州黃巧崗烈士陵園建築空間中的政治話語與政治儀式（1911—1927）〉，南京大學研究生畢業論文，2016 年 5 月。

由於孫氏的死亡與喪禮已有多人作出討論，故此本文不想浪費篇幅重新評述，而是將以孫氏身後官方紀念為主題，反思他們如何成功將偉人營造成為民眾推舉崇拜，而又代表國家的圖騰象徵。本文旨在探究孫氏死後成為國家象徵一部分的過程，為了令探究更具立體，除了引用官方紀念規定及行動，亦著重討論民間反應，尤其是影響力巨大的平面媒體，是如何同時參與這場國家象徵的塑造。

今次會以《大公報》之社評作為除國民政府外的另一主要研究對象。1926年後由著名報人張季鸞等人主持的《大公報》，雖然標榜不靠攏國共兩黨，但仍然在每年孫氏忌辰（3月12日）發表紀念社評，對輿論營造有一定的影響。<sup>5</sup>到底《大公報》如何透過社評表達他們心中的孫氏，以及在國家意識和讀者需要這兩方面衝擊中，加了甚麼聲音，在每年紀念中填塞甚麼元素，這些都是值得去討論。

所以，文章會著重運用《大公報》報導<sup>6</sup>，從1927至1945年間孫氏忌辰官方紀念儀式規定及領袖／政要致辭、《大公報》社評回應兩大方面，探討兩方在營造孫氏作為國家象徵過程中的異同。本文以時代劃分，即孫氏去世至北伐成功前、北伐成功至抗戰前、及八年抗戰期間。每時代亦分兩部分評述兩方情況，第一部分是國民政府的官方紀念分析，反映他們如何藉孫氏鞏固自己北伐後的政權威信，又在抗戰遷都重慶時，怎樣拿孫氏團結國民；第二部分是《大公報》社評，到底他們的「孫中山」是否跟政府的一樣，他們又如何回應政府的意圖。而最後藉比較兩方異同，帶出兩方為孫氏進行包裝的同時，是合作「唱好」孫氏，還是分庭抗禮各自表述自己的「孫中山」，最後冀能表達到孫中山國父形象及國民政府與傳媒之間關係是如何。

---

<sup>5</sup> 高集，〈憶我的姑父張季鸞二三事〉，香港：《大公報》，2002年6月17日。

<sup>6</sup> 《大公報》1902年在天津創刊，張季鸞於1937年9月決定遷至漢口續刊，再於翌年12月起改在重慶辦報至抗戰勝利。因此本文引用的《大公報》版本，分別有天津版（1927—1937）、漢口版（1938）、重慶版（1939—1945）。

## 1. 孫氏去世至北伐成功前之孫中山紀念

每年3月12日孫中山忌辰，官方都舉辦紀念儀式。其實早在孫氏去世半年後(1925年9月12日)，由廣州國民政府宣布定3月12日為「大元帥逝世紀念日」，要求各機關學校放假及紀念。<sup>7</sup>當時北洋政府仍是國際普遍承認代表中國的政權，在北伐完成之前，南方國民黨政權並非堅固。面對如斯場面，他們一方面要解決內部矛盾、應對北洋政府，另一方面要推舉代表人物提升威信，孫氏倡導民主政體建立民國，無疑是國民黨推廣之首選。所以他們在翌年孫氏忌辰當日便要求全體廣州市民在觀音山鳴炮後默哀三分鐘，同時要各機關團體下半旗。<sup>8</sup>

這段時期除國民黨大本營廣州外，也偶爾有一些城市的黨員、學生自發悼念，例如北京大學學生會在1927年辦演講會，邀請周作人等嘉賓出席，上海的國民黨員也在法租界開追悼會，當地總工會亦率領廿萬工人默禱三分鐘，<sup>9</sup>北方地區如天津，在《大公報》鮮見相關紀念報導，應是北洋政府冷淡處理之緣故，但有民眾自發去紀念。可見雖然官方紀念儀式規模和作用都有限，但並不代表其他人不去悼念，而且這樣情況為日後國民黨公開在其他地方悼念有民意上之基礎。

至於當時總部設在天津，剛由張季鸞主持的《大公報》，又怎樣去「宣傳」孫氏呢？首先要了解該報版面安排和社評內容，很明顯地在孫氏死去頭三年忌辰當天，該報的頭版必見到有關孫氏的社評，在1927年忌辰更見到孫氏遺像在報頭上，可見到那邊的編採人員對其重視。即使在天津因北洋政府的控制鮮有公開孫氏紀念，民眾至少也可以透過閱報了解孫氏的事蹟，傳媒在這裡發揮引導輿論的作用。而他們透過社論說了甚麼話，我們又可以看1927年的內容（見本文下頁）：

今天是孫中山先生逝世二週紀念日，全國各地，國民黨黨員不用說，就是非國民黨員，也有許多人在那裏紀念他。我們就是拿這種資格，在這裏說話。論起孫中山可以紀念的事，當然很多，他那寬厚博愛的性格、堅苦卓絕的精神、高遠敏銳的眼光，都不失為偉大人物之特徵，可為後人景標，直至臨死，念念不忘。果然逝世不過兩載，外國人在中國八十年侵略政策的收穫，看看一處處根本動搖，使外國人對待中國發生一宗不敢藐視的覺悟。自然而然，要以平等相待，這實在是孫先生最大功績，也就是孫先生和別個偉人名士不同的特點。所以不僅他的黨徒應當紀念他，凡是中華民國國民都不應把他忘掉，因為他是拿中國國際地位提高，為民族解放而向世界奮鬥的。他不單是中國歷史上人物，而且有世界的價值，不能僅僅把他看作國民黨黨魁為止。<sup>10</sup>

<sup>7</sup> 國民政府令第54號，《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9號，1925年9月，頁20至21。

<sup>8</sup> 國民政府令第103號，《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26號，1926年3月，頁20至21。

<sup>9</sup> 〈北大孫中山紀念會記〉〈上海之中山紀念〉，《大公報》天津版，1927年3月13日，第13版。

<sup>10</sup> 〈社評：孫中山先生逝世二週紀念〉，《大公報》天津版，1927年3月12日，第1版。

張季鸞在社評說當時天津很多人都來紀念孫氏，似乎跟北洋政府的冷淡處理大相逕庭，他的說話似乎向北洋政府表示，孫氏才是國民認可的領袖，而不是僅僅一個黨派的黨魁，他其後 1929 年又重申此點，並指即使當時有「反國民黨」勢力主政，仍不阻其「欽慕孫中山」。<sup>11</sup>在張季鸞眼中，孫氏是拯救國民脫離列強欺負、振興民族的偉大人物，對其的讚美非常明顯，在文章也提到全體國民應要記住孫氏。所以，張季鸞雖然身在北洋政府勢力範圍，但其紀念孫氏的立場卻跟廣州的國民黨一致，他眼中的孫氏是「有世界的價值」的偉大人物。



不過，是否要國民對孫氏作「神」一樣的敬拜，該報就對此保留。該報在 1928 年的忌辰紀念社評早已指出南方出現「偶像化」，及後在南方出現一些因為要建孫氏紀念設施而要拆遷房屋的新聞，就令張季鸞看不過眼。雖然他未在忌辰紀念上批評此做法，但在同年 11 月就借誕辰紀念來大肆批評，明言「偶像化的紀念中山，為絕對不可，而凡言紀念者，須紀念中山先生之精神，紀念其革命性」。<sup>12</sup>他的宣言，不單反映到孫氏的國家形象日漸成形，還要出現與北洋政府態度截然不同的紀念熱情，所以《大公報》在幫助塑造孫氏偉人形象同時，亦提倡大眾要以正確方式，理性紀念這位偉大人物，而不是因出於自己利益而作神靈式盲目敬拜。不過張季鸞的擔憂，似乎在北伐成功後逐漸成真，後文會有討論。

<sup>11</sup> 〈社評：孫中山先生逝世四週年紀念〉，《大公報》天津版，1929 年 3 月 12 日，第 2 版。

<sup>12</sup> 〈社評：所以紀念孫中山先生之道〉，《大公報》天津版，1928 年 11 月 12 日，第 1 版。

## 2. 北伐完成至抗戰爆發前

在北伐完成後，國民黨取代北洋政府成為統治全中國之領導人，紀念孫中山的規格得以大大提高，紀念城市增至十多處。<sup>13</sup>國民政府在奉安大典時已經有意制定不同宣傳方案，並透過口號營造他成為媲美堯舜的「至大、至聖、至德」的總理形象，後來又透過總理紀念周，將制度化紀念融入生活中。<sup>14</sup>儀式、規定也透過《大公報》紀錄而顯示出來，流程包括向黨旗、國旗、遺像行三鞠躬和恭讀遺囑，旨在通過重複性的神聖儀式營造孫氏高貴形象。<sup>15</sup>每年忌辰的宣傳、政要致辭等，會根據不同政治訴求進行具體規定，相同儀式在不斷操演中被賦予政治內涵。

1929年孫氏忌辰是東北易幟後的第一次紀念，國民黨在南京、北平等都有盛大紀念活動，但當時軍閥殘餘未除，共黨勢力又崛起。南京方面國民黨中央黨部辦紀念會，儀式包括奏哀樂、唱黨歌、行禮讀遺囑、奏哀樂、讀祭文、奏樂等，中山陵也舉行植樹禮，蔣介石等政要出席，他在祭文中表示：「哲人長往，列強耽視，軍閥橫行，華胄存亡，一髮千鈞，痛念遺囑，稟承奮鬥，團結一致，國軍北伐，摧枯拉朽，奠定寰區，敢云成功。」于右任演說也道：「四年前總理停靈地無著，要求中央公園求而不得，李協和因之大罵段氏代表，當時情形，何等可憐。」他續說因北伐成功中國統一，才能有體面地紀念孫氏，二人都將未能盛大紀念歸咎於軍閥勢力作怪。<sup>16</sup>

北平方面，在市內多處都有植樹和設壇致祭，其中上午官方主辦太和殿各界紀念大會，五千位農工商學各界及黨員掛黑紗、佩白花參與，儀式包括鳴砲、升半旗、奏哀樂、向黨國旗行三鞠躬、向遺像行三鞠躬、恭讀遺囑、靜默三分鐘、主席獻花圈、讀祭文、代表致辭及演講、喊口號等。同樣地，主席谷正鼎、張清源皆指責軍閥禍害全中國，呼籲國民要謹守孫氏遺志掃除軍閥。谷說：「今日紀念總理，〔……〕應認識總理十三年改組排除腐化投機分子之精神，〔……〕下層工作做好，革命前途自能日益開展。」張也說：「現在黨內的反動勢力均已團結一致，向革命勢力進攻，革命者應組織起來，團結起來，與反革命者奮鬥。」大會口號除了有「誓遵總理遺教」，也包括「取消不平等條約、撲滅中國共產黨、打倒西山會議派、〔去〕除無政府黨、肅清一切反動勢力」等，矛頭直指軍閥和共黨。<sup>17</sup>

以上言辭皆營造孫氏成為打倒軍閥、共黨的領航者，以告訴黨員和國民要完成孫氏心願建立統一的國家，蔣氏在紀念同時亦不忘指責「反革命者」，需要透過《總

<sup>13</sup> 〈孫先生逝世紀念會久而彌盛〉，《大公報》天津版，1931年3月13日，第3版。

<sup>14</sup> 李恭忠，〈孫中山崇拜與民國政治文化〉，《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04年12月，頁101至111。

<sup>15</sup> 丁留寶、張潔，〈紀念活動與政治表達：南京國民政府對孫中山的紀念（1937—1945）〉，《蘭合世界》，2013年7月，頁39至40。

<sup>16</sup> 〈首都昨日之紀念大會 中央黨部與飛機場〉，《大公報》天津版，1929年3月13日，第3版。

<sup>17</sup> 〈中山逝世四週年 北平紀念會詳誌〉，《大公報》天津版，1929年3月13日，第3版。

理遺囑》來提升士氣。國民黨認為軍閥和共黨是阻礙革命進行的反動派，有違孫氏建國目的，所以需要利用正統去爭取自己的合法性，告訴反動者既不要妄想拉倒國民黨，也不要跟孫氏作對。在這幾年間，陸續有地方政府代表在孫氏忌辰紀念表達支持孫中山及反共反軍閥的訴求，包括 1931 年的北平和西安紀念大會。<sup>18</sup>

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後，孫氏紀念仍然繼續，形式上大同小異，只是主題上變成日軍侵華帶來的國難，此舉令孫氏的象徵變為保衛民族的救星。例如 1932 年即九一八後的首次孫氏忌辰，汪精衛致辭中反覆提及日軍帶來的國難，並謂：「我們今天紀念總理，必要把總理所預料的國難設法打破，才不愧為總理的信徒，我們對於日本的侵略，要堅決抵抗。」<sup>19</sup>往後幾年汪精衛在每年同一儀式說著相近的說話，他認為只有國民依孫氏精神跟日軍進行消極抵抗，並且要學孫氏「和平奮鬥救中國」，這樣才令孫氏死而無憾。上面的演辭清楚指出救國的主要途徑是靠《總理遺教》，孫氏就是帶領國民對抗日軍的苦海明燈。事實上，汪氏將孫氏跟應對日軍侵華拉上關係，只不過是以對方作為幌子，為蔣氏安內攘外政策作為辯護。<sup>20</sup>所以不難理解為何汪氏在 1935 年孫氏忌辰說要著重剿匪：「救亡圖存的工作，治標莫急於剿除共匪，治本莫急於生產建設。」<sup>21</sup>

至於《大公報》社評方面，因天津被國民黨接管，篇幅上有重大變化，例如 1929 年忌辰當日除了有一大版專題報導，在後面幾頁都有地方紀念情況，貫徹反映該報支持孫氏的立場。雖然該報擁護蔣介石，反對向日本宣戰，不過從社評而說，並非每時都緊貼蔣介石，反而堅持其理性態度。在九一八之後，該報沒有如國民政府大肆批評日軍行徑，而是反思國難發生的內部原因，提出真正的孫氏形象和切實的救國方法。在三十年代初期紀念社評，張季鸞主要針對兩件事，第一是國民黨內分化嚴重，第二是孫氏紀念過度「偶像化」，他指這些都是違反孫氏遺志，導致國家淪落。1931 年社評引前一年中原大戰和共黨作亂，批評黨內不團結：

此曹之收穫，良有其自取之道，然當其週旋舞台之際，就民衆觀之，固未嘗不樹國民黨之旗幟，而標中山先生之學說也。在同一旗幟同一教義之下，造成對壘斫殺互相背馳之局。黨國之不幸，抑豈先生所能料及。一言以蔽之，其病在將此開國偉人過度偶像化故也。先生黨徒誦遺教者日多，而先生之精神，似轉有日就淹沒之慮，此為今日最堪危懼之現象。〔……〕今日黨國上下，無間朝野，評人衡己，無不摭取先生之片言斷語，以為引證，大抵心中先自預存一種成見，然後比附先生遺言之類於已說者，標而出之。行同號而行軍祭，不敬莫甚於此。先生在日因揚劉標國民

<sup>18</sup> 同註 13。

<sup>19</sup> 〈中山先生逝世七週年 南京舉行紀念大會 汪精衛之沉痛演說〉，《大公報》天津版，1932 年 3 月 13 日，第 3 版。

<sup>20</sup>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頁 17。

<sup>21</sup> 〈中央紀念會汪委員報告〉，《大公報》天津版，1935 年 3 月 13 日，第 3 版。

黨之旗號，閹割據之實，曾面斥曰：「你們戴着我的帽子，糟蹋我的家鄉。」先生有知，對今日之滔滔者，當必斥以：「你們戴着我的帽子，糟蹋我的學說」矣。<sup>22</sup>

這番話在往後三、四年都是差不多，雖然這些社論都跟國民黨政要在忌辰的致辭一樣都是指著國民黨說的，但兩者的分野就是在於張季鸞的具體批評對象，並不是政要眼中個別所謂的「反動勢力」，而是針對所有國民黨員去說的。他認為，國民政府為繼續建立威信，繼續拿孫氏作為象徵國家的護身符，表示孫氏即是權威，要切實遵照孫氏指示才能完成國家大事，但自己卻是腐敗不堪，糟蹋孫氏的家鄉。更重要的是，社評沒有如蔣氏等政要將共黨和日軍成為其眼中釘並加以指責，反而倒過來批評那些外來的禍害都是「自己人」帶來的，因為他們內亂緣故，自耗國力，招惹煩惱，跟孫氏作對、阻礙革命進行的，就是國民黨自己。

故此他再次指出，真正孫氏之國家形象，並不是只停於弘揚「三民主義」的民族圖騰，也不是政府口中的「至大、至聖、至德」的守護神，而是其背後的「三民主義」中的民族、民權和主義本身。國民更不應一邊口說孫氏遺志，一邊興波作浪製造混亂。真正的紀念孫氏和對付外界威脅之方法，就只有「一致的公忠廉潔，謹慎勤苦，以奉行中山先生之主義，對民政及軍政，有大刀闊斧之改革，法紀嚴明，人民樂業，全國政治上軍事上，確蒸蒸日上，則外患必不來也」。<sup>23</sup>

---

<sup>22</sup> 〈社評：孫中山先生逝世六週年〉，《大公報》天津版，1931年3月12日，第2版。

<sup>23</sup> 〈社評：孫中山先生逝世八週年〉，《大公報》天津版，1933年3月12日，第2版。



### 3. 抗戰爆發期間

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遷都重慶，但孫中山紀念不單沒有停止，反而還擴大紀念。國民黨認為要救國民脫離險境，還需要借紀念革命先驅號召國民抵抗。國民政府1939年起在孫氏忌辰紀念的基礎上新增「國民精神總動員」活動，又訂立活動綱領和實施辦法，及邀請蔣介石當精神總動員會會長，帶領國民以孫氏倡導的八德做好精神建設，以達成愛國愛民族之情操，以及抗日救國。在《國民公約》中，孫氏的三民主義擺在第一條，置在抗日承諾之前，以示孫氏精神之重要。<sup>24</sup>在活動綱領中的第四條「建國之信仰」，三民主義是被視為抗戰的信仰基礎。<sup>25</sup>

至於1942年紀念大會，教育部長陳立夫宣稱國民能夠抵擋日軍頑強存活，是因孫氏教導國民的三民精神，其中「民族」賦予生命力、「民權」賦予組織力、「民生」賦予生產力。<sup>26</sup>以上文本都見到國民政府有意將孫氏精神，融入以抗日為本的生活當中，同時讓國民以另一種方式紀念孫氏，他們就算在忌辰當日參與總動員，都被視為等同參與紀念孫氏。因三民主義已跟抗戰拉上關係，且蔣氏將抗戰定位為民族存亡之戰，所以孫氏在這時候成為民族主義的代表人物，孫氏的符號核心就變了凝聚民族、激發愛國的精神。<sup>27</sup>

國民政府同時仍維持往常紀念儀式和造林運動大會，儀式沿襲抗戰前流程，這表示孫氏紀念已達恆常化，政要致辭是和抗戰有關，例如1939年居正「紀念總理要堅持抗戰」的報告，貫徹往常將意識形態帶入偉人紀念之中，使孫氏形象更立體。<sup>28</sup>到了1940年官方紀念活動更由早到晚舉行，場面盛大。當時的《大公報》報導中的忌辰紀念和總動員活動，大都是正面健康的場面，少了肅穆的儀式氣氛。這樣其實都是配合「國父」是國民精神之源的形象，便於進行抗戰動員。<sup>29</sup>

今日為孫公逝世十五週年及精神總動員週年紀念日，上午有紀念會，各界在郊外數地分別栽植孫公紀念林，下午軍警檢閱，體育及滑翔表演，晚有盛大提燈會。預計萬人空巷，盛況空前。〔……〕渝市則定十二日下午六時半起分中央區及三個分區分別舉行紀念會，會畢火炬遊行，中央區暨各分區行列均在指定地點會合，啣接出發，以兩路口為解散地點。〔……〕中央區開會儀式：①宣告開會，奏樂。②主席就位。③唱國歌。④全體向國黨旗及總理遺像行最敬禮。⑤主席恭讀總理遺囑。⑥

<sup>24</sup> 〈國民公約〉，《大公報》重慶版，1939年3月12日，第2版。

<sup>25</sup> 〈國民精神總動員 動員綱領辦法及國民公約公布 國防最高委員會宣布開始實行〉，《大公報》重慶版，1939年3月12日，第2版。

<sup>26</sup> 〈陪都昨晨大會 紀念精神總動員三週年〉，《大公報》重慶版，1942年3月13日，第2版。

<sup>27</sup> 陳嘯軒，〈中共與孫中山的「社會主義」〉，香港：《蘋果日報》，2011年10月17日。

<sup>28</sup> 〈紀念總理逝世十四週年 中央國府昨開會 造林運動大會同時舉行 各地分別開會紀念〉，《大公報》重慶版，1939年3月13日，第2版。

<sup>29</sup> 〈陪都盛會 紀念精神總動員二週年 體育表演千人合唱 蔣委員長親臨檢閱 中樞紀念國父忌辰〉，《大公報》重慶版，1941年3月13日，第2版。

為抗戰陣亡將士及殉難同胞靜默。唱精神動員歌曲。⑧請蔣會長為國民精神總動員週年紀念向國內外同胞廣播訓詞。⑨唱領袖歌。⑩國民精神總動員會張書長宣讀國民公約及誓詞，全體循聲朗誦。(十一)開始火的巡禮引火。[……](十二)巡行火源。[……](十三)火炬遊行。[……](各區開會秩序從略)<sup>30</sup>

到戰爭中段，日本扶植汪精衛政權，蔣氏予以聲討和反擊，在那時候孫氏同時被南京汪氏和重慶蔣氏抬舉成為「神」一樣的人，目的就是樹立權威，孫氏的政治符號透過兩邊紀念而表露無遺，進一步深化成為各自的國家象徵。汪氏自認為是孫氏精神的正統繼承人，而在蔣氏那邊就成為團結黨內外志士和全體國民的帶路人，以激勵各界一致向外抵抗。在重慶國民政府在 1940 年尊稱孫氏為國父時，汪氏亦跟隨頒布《尊崇中華民國國父致敬辦法》，要求所有集會場所掛孫氏遺像，民眾在那裡舉辦活動前要背《總理遺囑》。身在重慶的政要當然把握機會作出反擊，除了推行《國父紀念週暨國民月會合併舉行儀式》，定立唱國歌、向孫氏遺像三鞠躬、讀《總理遺囑》等儀式規定，他們在紀念會中亦批評汪氏等「偽政權」。<sup>31</sup>例如 1941 年的官方紀念，吳敬恆和于右任都不點名指責汪氏的行為。<sup>32</sup>

其實這些人急不及待指責汪精衛，源於汪氏所創立的各政體機關跟重慶的幾近一致，還要拿孫氏奉為他們的國父，嚴重影響蔣氏在重慶以至全中國的統治權威與合法性。不過兩方都爭奪孫氏的國家形象，大多能夠反映孫氏在其去世後，已經被政要成功抬舉和「神化」，本來從一位已死去的普通人物，躍升為媲美歷代帝王的國父，國父尊稱的出現，不止是各界對其革命建國的事蹟懷念，亦是國民黨一貫政治包裝的成果。在重慶蔣氏方面而言，如果不利用孫氏及加強宣導其國家象徵特色，例如額外辦「國民精神總動員」以擴大參與對象，就不能凝聚國民及開導民族思想，達成各界維護政權的效果。

正當官方拿孫氏紀念去進行抗戰動員，鞏固威信之時，《大公報》也有在每年紀念社評中配合官方口徑進行動員，有時還開紀念專號邀請名人撰寫評論。不過他們著重之處，依然在於希望國民反思體制腐敗和敵人入侵的關係，在抗戰頭幾年張季鸞依然做主筆的時候，都是批評黨員、官員曲解孫氏精神和食古不化，成為國家發展重大障礙，必須盡快修正，並團結一致謀民族幸福。

孫先生是中國民族偉大的領袖。但領袖的偉大，畢竟屬於領袖。我們如不努力，則徒辜負領袖，辜負主義。具體的說，假令孫先生逝世後，人們都照孫先生那樣純誠，那樣奮鬥，中國國力，一定比現在大得多。孫先生的主義，早是中國建國的正式方

<sup>30</sup> 〈今日孫公忌辰 精神總動員週年 今晚紀念會並火炬遊行 蔣會長向國民廣播致訓〉，《大公報》重慶版，1940 年 3 月 12 日，第 2 版。

<sup>31</sup> 馬克鋒，〈先生、總理與國父——孫中山尊稱的歷史考察〉，《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 年第 5 期，頁 11 至 21。

<sup>32</sup> 同註 29。

針了，但我們大家奉行的人，或者熱誠不夠，或者見識不夠，或者在革命名義之下，而行爲竟官僚化軍閥化。當然建國的障礙，本來不少，而最大的障礙，毋寧說就在我們自稱奉行孫先生主義的人們自己的精神與行爲之中。〔……〕我們大家，今天紀念孫先生，不能專在中山全書中，讀理論，記文辭，我們必須要以孫先生一生之精神行爲爲師表，爲模範，我們要常常自省自勉。特別希望政府在抗戰中，更明法紀，嚴賞罰，在三民主義之下，必須使舊時代之頹廢自私甚至貪婪瀆職之賸餘的惡風，完全一掃。在抗戰中，不只要更昌明中山主義，而更需要普及中山精神，這必須兼賴法紀賞罰的國家權威，方可以收到圓滿效果。<sup>33</sup>

張季鸞在抗戰開始至其 1941 年去世，一直將孫氏塑造爲中華民族的代表、偉大的革命導師，並不斷重申孫氏推翻異族統治，從敵人手中解放出來，後來重慶總動員活動開始，更是不斷強調孫氏精神思想之應用，他這樣的辭令，跟蔣氏在忌辰紀念活動演講的處理手法大致相同。雖然他沒有批評蔣氏借 1939 年起的總動員來建立威信的行爲，甚至不時引用蔣氏說辭並擁護，但不代表他偏袒對方。他認爲，過去國民政府只是表面渲染孫氏成爲國家象徵和做政治包裝，但沒有將其精神貫徹在行政當中，致使體制效率不足，再加上跟軍閥和共黨的鬥爭及分化，跟孫氏國家民族內外統一的願望離開得愈加遠。在此之下，他一遇到孫氏紀念日子，便立刻批評「黨員官吏及全國國民」所作所爲，並呼籲他們在憤恨敵人的同時，更要對自己囫圇吞棗和借孫氏之名行自私行爲作出反省。

或許當時會有人質疑張季鸞是借孫氏來表達親蔣和支持其他蔣氏的政治宣傳，但從社評內容觀之，無論是汪精衛抬舉孫氏，抑或是蔣氏過度崇拜，他都不贊成，他所提出的，仍是希望國民融會貫通，利用孫氏思想，理性研究抵抗，並要從整體利益出發，團結紀念。他死前的社評，大概有三個方向。第一是強調孫氏的主張和遺言都是救國的不二法門，他冀望民眾明白孫氏的所言所行，甚至他們過去不斷背誦的《總理遺教》，也是爲民族而設計的，並非用於爭取自己在群體中的話語權，所以絕不能用於增添光環，也不宜用於批評政敵。第二是紀念孫氏，即爲國家爲民族而負責，亦代表要有犧牲的可能，凡自稱要跟隨孫氏的人，都要有思想和行動上的準備，透過孫氏的教訓做好「反侵略」的應對，並全力支持和慰問前線抵抗的軍民，因為他們是真正實行孫氏精神的人。<sup>34</sup>

第三點也是重要的一點，他呼應重慶總動員活動，指總動員是給予國民精神建設的機會，強調「孫先生的精神不死，他的精神在領導我們抗戰，領導我們建國，一定要達到勝利與成功之域」，所以勸勉大眾要做好精神建設，實行理性的愛國主義，並「一定要有復失地、盡責任、驅敵軍、誅逆奸的志氣，戰能勝，建成不

<sup>33</sup> 〈社評：孫中山先生逝世十三週紀念〉，《大公報》漢口版，1938 年 3 月 12 日，第 2 版。

<sup>34</sup> 〈社評：孫中山先生逝世十四週年紀念〉，《大公報》重慶版，1939 年 3 月 12 日，第 2 版。

可侵侮的國防，求得中國的自由平等，以完成國父未竟之業」。<sup>35</sup>自張季鸞去世後至抗戰勝利，繼任人王芸生都是循這個方向展開討論，標題上均與「精神動員」<sup>36</sup>有關，重申「政府當初選定國父逝世紀念日來實行精神動員，就有特別的意義，希望國民至誠接受國父的遺教，奮發努力，克服困難，達成抗建的任務」，<sup>37</sup>社評想表達的是想國民從起居習慣做起，徹底應用「國父思想」，「只要大家真知真行，切勿再空喊口號」，這才是真正紀念孫氏。

---

<sup>35</sup> 〈社評：國父忌日與精神動員〉，《大公報》重慶版，1941年3月12日，第2版。

<sup>36</sup> 1942、43、45年孫氏忌辰《大公報》社評分別是：〈精神動員！〉、〈加緊動員爭取勝利〉、〈篤實踐履精神動員〉。

<sup>37</sup> 〈社評：篤實踐履精神動員〉，《大公報》重慶版，1945年3月12日，第2版。

#### 4. 討論：官方與《大公報》在營造孫中山形象的背後

從上面近廿年來的官方忌辰紀念儀式和活動，與及《大公報》同期的社論，可以見到他們雙方對孫中山作出的評價和形象塑造。在孫氏去世到國民黨蔣介石北伐成功前，北洋政府冷淡處理孫氏紀念事宜，並認為其只是「黨派的黨魁」，而南方國民黨和《大公報》則對孫氏形象作出一致的立場，皆認為孫氏是拯救國民的偉大人物，並呼籲國民作出紀念。不過《大公報》一直強調的是，是要正確方式理性紀念，不能對其做出「神」一樣的敬拜，也不希望出現「偶像化」，可惜他們的擔憂最後成真，而且在營造孫氏國家形象的方式上，跟國民黨出現分歧。可以說，雙方的確同時「唱好」孫氏，但過程和手法各有不同。國民黨眼中的「孫中山」是「個人崇拜」的產物，即使因要紀念孫氏而侵占他人權利或者「搶光環」也在所不惜；但《大公報》顯然不認同這種手法，堅持要「融會貫通」紀念孫氏，並且將其遺教真正地以具體方式踐行出來。

這背後反映到雙方背後價值觀的衝突，甚至是政府和傳媒間的不信任狀況。蓋因國民政府一直想尋找統治的合法性，並想透過民族主義來獲得國民認同<sup>38</sup>，但像《大公報》的傳媒卻想實踐「第四權」，除了施行其社會責任，亦充當國民的喉舌，在爭取新聞自由的同時，偶爾嘗試同時爭取全面的自由民主，有時更為了保持其新聞專業，而不惜跟當權者作對。<sup>39</sup>所以，雙方的底線如果被觸碰，就會引起不少風波。本文提及官方與《大公報》營造孫氏形象時歧見，已算是溫和，他們的分別只是營造手法的不同，但他們都是支持孫氏。

張季鸞接手後的《大公報》一直堅持的是「四不方針」，即「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強調自己的獨立性，唯一效忠的就是自己的新聞專業，這是該報營運的重要支柱，不難明白當該報見到一些社會不公、官吏腐敗等影響社會的事情，便會挺身而出，他們見有人為紀念孫氏而要拆民居，作出批評是自然不過的事。該報曾經有多次公開批評國民政府所作所為，又先後批評吳佩孚、汪精衛，甚至亦曾批判蔣氏在「清黨」中誅殺青年和娶宋美齡為妻的事件，不過最終只引起國民黨員和政府的不滿，繼而不了了之。而張季鸞則因自己做過孫氏秘書，以及其與蔣氏幕僚陳布雷、于右任是朋友關係，而獲蔣氏理解，後來更成為知己。<sup>40</sup>

除了《大公報》可以因張、蔣關係而得以避過當局打壓之外，《申報》等其他大型報紙，則因不同磨擦常被蔣氏視為眼中釘，顯然比前者倒楣。著名的例子就是《申報》史量才在蔣氏 1931 年第二次下野時發表〈歡送〉，諷刺其領導能力不佳

<sup>38</sup> 姜義華，〈中國民族主義的特點及新階段〉，《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04 年 12 月，頁 60 至 64。

<sup>39</sup> 李金銓，〈回顧《大公報》和張季鸞的文人論政〉，《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15 年 10 月，頁 18 至 23。

<sup>40</sup> 黃昆章，《被扭曲的民國報人史：張季鸞、范長江們的筆下人生》，臺北：獨立作家，2016 年 1 月，頁 48 至 62。

導致腐敗嚴重，後來又反覆批評國民政府「圍剿」行動和黨員挪用救災款項之事，最後不單沒有得到蔣氏的諒解，更惹來殺身之禍。其實，《大公報》在張季鸞去世後亦不是好好過，其接班人王芸生在 1943 年因發表《看重慶，念中原！》社評，批評國民政府腐敗行為，竟然遭對方停刊三天，蔣氏亦沒有網開一面。<sup>41</sup>

事實上，這與國民政府的統治合法性息息相關。自從孫氏推翻滿清之後成立民國，美其名驅除了韃虜，建立了中國人治理的國家，但從北洋政府時期到抗戰期間，國民政府並非很堅固，由於過去軍閥林立、貪腐問題，再加上國民政府管理的地區非常多，致使無法一時有效建立到管治合法性，這逼使政府做出多種措施維持其統治，自三十年代起，國民政府實行表面訓政，實為一黨專政的手段，即為出於上述原因。另外，營造孫氏符號是積極性方法，而管制傳媒、成立黨媒等則是消極應對傳媒潛在叛變危機。<sup>42</sup>這可反映官方與傳媒的衝突經常發生的原因。

回到孫氏符號的話題，雖然《大公報》借孫氏紀念去批評政府和官吏「偶像化」孫氏，但如果細心留意其手法，亦可以看到該報其實都是抬舉孫氏。大陸新聞學者劉洋在研究 1926 至 28 年《大公報》指出，他們「以之（孫氏）為鏡鑑批評其心目中偏向之國民黨」，並謂這是過往皇帝時代書生論政、「致君堯舜」的延續，意思是他們要通過「神化孫中山」才能有效地規勸蔣氏。<sup>43</sup>筆者無意評論劉先生的敘述，但想到的是如果按照劉先生的說話，這樣顯示到《大公報》的「神化孫中山」，跟其反對國民黨做「個人崇拜」之言論，那就是自相矛盾，自打嘴巴了。同樣衍生的問題就是，究竟這個孫氏紀念與符號是屬於誰？是國民政府？是《大公報》等傳媒？還是其他人？如果要得到答案，恐怕要花費更多時間研究。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無論誰來爭奪，至少證明到孫氏在死後已經是國內人人尊敬，獲得極大讚譽的偉人，並有能力擠身在國家象徵之列，他們覺得孫氏為民族存亡而鞠躬盡瘁，在這個軍閥坐大、外敵入侵的時期，是團結民眾的力量，因此要被後人景仰和歌頌。正如文首所講，即使有些地方沒有官方儀式，或者民眾沒有參與過孫氏葬禮等身後事，他們至少也可以透過官方宣傳和閱報了解孫氏的事蹟，政府和傳媒在這裡發揮引導輿論的作用。透過宣揚孫氏事蹟作為紀念，至少可以令政府更易被認同，而傳媒或許可以多售出幾份報紙。總之，在印刷術日漸發達的中國，不同方面都用自己話語來介紹民族的象徵，並將國家民族思想緊扣一起，不單可以得到外界認同，而且可以提升身價或維護自己權益。

---

<sup>41</sup> 唐小兵，〈報人張季鸞與史量才的異途殊歸〉，上海：《東方早報》，2013 年 5 月 28 日。

<sup>42</sup> 曹立新，〈抗戰時期新聞管制與報人言說〉，《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10 年 8 月，頁 34 至 42。

<sup>43</sup> 劉洋，〈偶像與鏡鑑：新記「大公報」的孫中山形象呈現（1926—1928）〉，《江蘇省首屆傳媒學科研究生論壇論文集》，2014 年 12 月，頁 298 至 305。

## 5. 結語

安德森在《想像的共同體》曾經說過，民族主義以及國家象徵的出現，在於那國國民的「想像」，他們亦「想像」為國而亡的先烈是好的。在近代中國，隨著西方印刷技術的引入，以及時代變遷帶來的新文化運動，「中國人」概念逐漸浮現，並且將這概念透過各方式的包裝，展示給下一代看，「國父」就是其中的一種。<sup>44</sup>孫中山死去時身份只是政黨領袖，後來國民黨決定從上而下將孫氏塑造成功至高無上的人物，並透過各種儀式、葬禮及紀念等，加上當時不同媒介的宣傳，成功將「國父」植入孫氏身上，並且導入大眾記憶為一種能夠「想像」的人物，並將其三民主義和民族主義掛勾，成為中華民族的代表載體。

本文談論的，是孫氏如何透過死後的紀念，成為今日見到的國家象徵，本文的孫氏塑造參與者，不只是國民黨官方，傳媒亦有份參與，張季鸞的《大公報》是其中一個例子。我們見到，兩方面都一同營造孫氏的神聖形象。國民黨方面，除了每年恆常化辦忌辰紀念，亦隨時代背景去填塞不同的政治內涵。《大公報》方面，是透過社評，將主筆自己所觀察的、所認識的價值融入其心目中的孫氏形象，再配合每年的紀念日表達出來。不過我們發現到，《大公報》縱然同時「唱好」孫氏，但他們還是堅持要「融會貫通」紀念孫氏，強調「不只要更昌明中山主義，而更需要普及中山精神」。最後更知道，國民政府和傳媒的背後價值觀衝突，並不是想得太簡單，部分傳媒實踐「第四權」，卻付上了沉重代價，只是張季鸞因跟蔣介石的微妙關係，才能夠脫險。不過這也證明到孫氏在死後已經是國內人人尊敬，獲得極大讚譽的偉人，並有能力擠身在國家象徵之列。

（完）

---

<sup>44</sup> 王菡，〈Benedict Anderson 書摘：我們為何迷戀民族國家〉，香港：《端傳媒》，2015年12月13日。

## 6. 參考資料

### 原始資料：

- 《大公報》：天津版（1927—1937）、漢口版（1938）、重慶版（1939—1945）。
-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 9 號（1925）、第 26 號（1926）、渝字第 254 號（1940）。

### 專書：

- 陳蘊茜，《崇拜與記憶：孫中山符號的建構與傳播》，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 8 月。
-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
- 黃昆章，《被扭曲的民國報人史：張季鸞、范長江們的筆下人生》，臺北：獨立作家，2016 年 1 月。

### 論文及文章：

- 潘淑華，〈國葬：民國初年的政治角力與國家死亡儀式的建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83 期，2014 年 3 月。
- 王來兵，〈現代性轉型背景下的權力與建築—廣州黃巧崗烈士陵園建築巧間中的政治話語與政治儀式（1911—1927）〉，南京大學研究生畢業論文，2016 年 5 月。
- 李恭忠〈孫中山崇拜與民國政治文化〉，《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04 年 12 月，頁 101 至 111。
- 丁留寶、張潔，〈紀念活動與政治表達：南京國民政府對孫中山的紀念（1937—1945）〉，《蘭台世界》，2013 年 7 月，頁 39 至 40。
- 馬克鋒，〈先生、總理與國父——孫中山尊稱的歷史考察〉，《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 年第 5 期，頁 11 至 21。
- 姜義華〈中國民族主義的特點及新階段〉，《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04 年 12 月，頁 60 至 64。
- 李金銓〈回顧《大公報》和張季鸞的文人論政〉，《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15 年 10 月，頁 18 至 23。
- 曹立新〈抗戰時期新聞管制與報人言說〉，《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10 年 8 月，頁 34 至 42。
- 劉洋，〈偶像與鏡鑑：新記「大公報」的孫中山形象呈現（1926—1928）〉，《江蘇省首屆傳媒學科研究生論壇論文集》，2014 年 12 月，頁 298 至 305。
- 高集，〈憶我的姑父張季鸞二三事〉，香港：《大公報》，2002 年 6 月 17 日。
- 陳嘯軒，〈中共與孫中山的「社會主義」〉，香港：《蘋果日報》，2011 年 10 月 17 日。
- 唐小兵，〈報人張季鸞與史量才的異途殊歸〉，上海：《東方早報》，2013 年 5 月 28 日。
- 王菡，〈Benedict Anderson 書摘：我們為何迷戀民族國家〉，香港：《端傳媒》，2015 年 12 月 13 日。